

高校改革与发展参考

2010年第2期（总第23期）

中国矿业大学发展规划处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

【编者按】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也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必然路径。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国内高校的普遍共识。我校作为国家能源资源科教的重要基地，当今国际能源资源合作的发展潮流为我校提供了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能源政策法规、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利用等方面都为我校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前景。目前我校确立了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在能源和资源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特色鲜明的多科性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的目标，这一目标促使我校必须加快国际化进程，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探索完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增强能源资源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本期《高校改革与发展参考》聚焦高等教育国际化，收集了相关资讯和动态信息，供各位校领导参考。

本期目录

国际能源合作与我国能源类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	3
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践行与展望·····	8
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新趋势·····	13
动态信息·····	21

国际能源合作与我国能源类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

段春明

国际能源合作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话题,也是能源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世界各国各地区间能源资源、技术、信息、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世界能源需要加强合作,加强合作需要诚实互信,需要互利共赢。中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与对话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原则。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开展对外能源合作,并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方面采取的策略措施

(一) 多边能源合作

中国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工作组、东盟 10+3 能源合作、国际能源论坛、世界能源大会及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的正式成员,是能源宪章的观察员,与国际能源机构、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国际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

(二) 双边能源合作

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等许多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都建立了能源对话与合作机制,在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环保、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在能源政策、信息数据等方面开展广泛的沟通与交流。

(三) 合作共赢策略

在国际能源合作中,中国既承担着广泛的国际义务,也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将继续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以互谅互让的精神和坦诚务实的态度,与国际能源组织和世界各国加强能源合作,加强沟通与对话。坚持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扩大利益的共同点,在沟通中增进了解,在了解中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二、中国在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进入活跃期
众所周知化石燃料消耗的外部成本很高,且没有被计入经济发

展成本。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仅煤炭使用每年的外部成本就高达1000 亿美元。生态环境恶化、温室气体排放急剧上升成为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与此同时,高消耗、高污染的黑色发展模型重新抬头。从2003年开始,中国万元GDP能耗开始上升,遏止这一趋势困难重重。目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从观念和文本落实到了各国政府的行动上,绿色发展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中国与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如中国正在参与新的大科学计划,包括参与由美国发起的未来发电计划和第四代核能的国际合作,以及与欧洲关于重力加速器材和激光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在此过程中也在发挥更多主导作用。目前中国已与30多个国家在新清洁能源合作达成双边协议,并将在此基础上推动多边合作计划。如中丹风能开发项目(简称WED),是中国和丹麦两国政府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展的技术援助项目,主要目的是以东北地区风电前期工作为重要内容,通过资源评价、专题研究、专业培训和人才培养等形式,学习和借鉴丹麦风电发展技术和经验,加强我国风电机构能力建设,推动我国风电技术进步,提高我国风电开发和运行管理水平,促进我国风电的健康发展,目前项目正在实施。

三、中国积极开展国际能源电力合作

(一)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电力合作

加强燃料动力领域的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有前景的合作内容之一。《上海合作组织至2020年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和2004年通过的《纲要措施实施计划》认为以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 油气勘探、开采及加工领域的合作发展;
2. 油气管道的设计和建造;
3. 燃料动力综合体设施的改造和现代化;
4. 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相互进入对方电力市场和在它们境内无障碍地输送电力创造条件;

5. 梯级水电站的联合设计和建设;

6. 新型的、非传统的、可用作电源的可再生能源的研制和开发。

其中第 3、4、5、6 条都和能源电力的开发、传输和使用有密切的关系。

2006 年 3 月 21 日,中俄签署了《关于全面开展从俄罗斯向中国供电可行性研究的协议》。该协议在 2005 年 7 月 1 日双方签署的长期合作协议的前提下,进一步确定了中俄电力合作的总体目标,规范了双方电力合作的工作内容,为中俄长期、稳定的电力贸易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6 年 11 月 9 日在人民大会堂中俄签署了《关于从俄罗斯向中国供电项目第一阶段购售电合同》,并签署了《关于实施从俄罗斯向中国供电项目基本原则的协议》。根据协议,国家电网公司从俄罗斯引进电力分三步走:第一阶段是到 2008 年,从俄罗斯远东电网向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电网送电;第二阶段是到 2010 年,从俄罗斯远东电网向中国辽宁省电网送电;第三阶段是到 2015 年,从俄罗斯远东电网或东西伯利亚向中国东北电网或华北电网送电。

此外,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就电力生产与传输等事宜积极洽谈合作。

(二)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电力合作

2005 年底,国家主席胡锦涛对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同年 10 月 31 日,在中越两国领导人出席的有关协议签署仪式上,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同越南国家电力公司签署了《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与越南国家电力公司有关向越南北部六省售电的合同》,为两国电力合作树起了一座里程碑。2006 年 6 月 1 日,中蒙电力合作各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开展在蒙古国建设煤电项目向中国输电前期可行性研究的协议》。根据协议,规划在蒙古国建设三个大型煤电基地,分别建设年产量 1200 万吨的煤矿和 6×60 万千瓦的坑口电站,同时建设 3 条单回输送能力在 300 万千瓦以上的 ± 500 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向中国送电。据悉,鲁能集团已经取得蒙古国锡伯敖包、额尔敦朝克图、柴达木查尔、德力格尔汗等四个矿区的探矿权或采矿权。通过对厂址、煤炭、水资源、交通运输等建设条件的分析,鲁能集团规划在

蒙古建设三座大型煤电基地,每座煤电基地分别建设年产1200万吨的露天煤矿和6×60万千瓦机组的坑口电站,最终建成总装机容量1080万千瓦、配套煤矿生产能力3600万吨/年的特大型能源基地。

(三) 中非论坛框架下的能源电力合作

在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对非务实合作8项政策,中非发展基金就是其中一项政策,是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非合作、开拓非洲市场而设立的专项资金。2007年6月26日中非发展基金正式开业,2008年1月中非发展基金与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共同投资加纳电厂项目,该项目是中非发展基金首批四个项目之一。2008年底中非发展基金同中国大唐集团海外(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非洲电力及相关产业投资领域进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推动非洲的电力产业发展。2009年2月4日,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在京签署了《合作投资开发非洲水电市场战略合作意向书》。双方将积极在非洲水电资源开发利用及相关领域开展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互补和互惠互利,共同推动非洲电力产业发展。2009年4月8日,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双方约定积极开展有关合作,共同对非洲项目进行投资与开发。总之,在中非论坛框架下的能源电力开发与合作将成为我国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领域。

四、国际能源合作为我国能源类高校发展创造的新契机

作为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交流的执行者,在大的国际能源合作的大背景下,国内能源类高校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发展机遇。如何积极采取措施,抓住国际合作的契机,打好国际能源合作这张牌,推动能源类学科实现跨越式发展是高校能源类学科国际合作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 在国家对外合作框架内,积极谋求能源

学科国际合作支点,建设能源类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根据国家国际能源合作的需要,国内能源类高校可以发挥自身在能源方面的学科优势,打好国际能源合作牌。在能源科技研究、能源人才培养、

能源战略和法律框架研究等方面积极申请承担国家级的对外合作任务。

其中,设立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是培育自身力量和迎接国家级重要能源合作项目的举措。通过建立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开展对国外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引入大师,进行前瞻研究,培养高层次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经过合作,这样的基地更有可能为国家承担高层次合作项目。

(二) 大力开展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

作为国家能源发展重点的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学科,应该成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方面。2007年10月12日电中国科学技术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发布并启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计划》。该《计划》将致力于推动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相关领域内的科技交流合作。《计划》确定了推动国际合作的六项重点任务:开展基础研究、建立产业化示范、面向规模应用、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国际交流与对话和培养高层次人才。

(三) 同境外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成立联合研发中心

当前我国在节能降耗、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技术提升空间,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是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内容。找到国外优秀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和设计,使我国高校能够担当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间合作桥梁,也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通道。

(四) 积极利用国外资金

在国际能源合作中,各能源组织和国际组织所提供的研究基金和赠款应该是对外合作中争取的重点。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和开发方面,面临很多机会。积极谋求多边、双边政府协议框架下的项目、资金、赠款也应该成为高校能源类学科对外合作工作的重点。

(摘自: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8月第4期)

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践行与展望

——以武汉大学为例

卢江滨/李晓述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飞跃,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时代潮流。在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界从接触、到争论、进而认同并勇于实践国际化的历程。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含着极为广泛的内容,涉及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而高等学校的三大功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之中,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因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或者说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必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30年来,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中国高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一直在不懈地探索和实践。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挑战

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中国高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中国高校的国际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在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方面也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可以欣慰的看到,大多数中国高校已然意识到人才培养国际化的重要性,正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并在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人才,中国高校需要实现三大方面的转变,以真正形成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环境。

(一)人才培养理念的国际化

革新传统守旧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实现人才培养国际化的前提。我国高校,尤其是一流大学,正逐步走上“开放式”办学的道路,以培养世界一流学生为目标,因此,确立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理念至关重要,为此,武汉大学很早就提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探索具备中国文化、中国背景、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些高校提出要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世界公民。这足以反映出中国高校人才培养

理念的历史性转变。

(二) 人才培养体系的国际化

人才培养体系的国际化包含诸多要素,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内容的国际化等,而培养模式的革新是关键所在。我国传统的培养模式,如班级授课制,重形式不重效果,重理论不重实践,重专业不重素质,存在较多弊端。欧盟高校在教学模式方面有较多可取之处,例如“双校园模式”,还有近年推出的“多校园模式”的国际联合硕士项目,学生在三至四所大学修完硕士课程,最终可获多校联合颁发的硕士文凭。

此外,在培养内容上,我国高校必须加强国际性课程建设,包括开设专门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或国际主题的课程、引进国际通用的先进教材、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等等。

(三) 人才培养环境的国际化

人才培养环境的国际化,也可称为校园国际化建设,即营造国际化办学的大氛围,主要是三个方面,即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和学生构成的国际化和学生交流的国际化。香港地区各大学的外籍教师已逾 40%,剑桥大学有 12%的本科生和 50%的研究生来自世界各国,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仅每年暑期到国外交流的学生就超过 500 人。通过简单的数据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环境的国际化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践行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校就开始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武汉大学等重点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始对外开放的高校,也是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先驱。1979 年,中法两国政府正式签署“文化交流计划”协议后,在两国教育部的支持下,武汉大学就开始了与法国高校在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探索,尽管还有困惑与彷徨,中国高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领域已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尽管中国高校由于受地缘等因素的影响,整体发展水平不太平衡,国际化办学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以下举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 创设国际联合培养特色班

30年前,国际特色班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试验田”。如今,这块“试验田”已产出了累累硕果,为国家培养大量的高端人才,并极大地推动了所在高校的学科建设。

从1980年起,武汉大学开设“中法数学试验班”及“中法数学(博士)试验班”。该试验班由中法两国教师共同担任教学工作,分别用汉语和法语进行教学。该试验班共培养了500多名毕业生,其中有100多人曾赴法留学或获得法国博士学位,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成为中国重要科研机构或知名高校数学学科的带头人。此次合作还造就了徐超江(1994年国际阿提雅奖获得者)、吴黎明(28岁晋升教授、曾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文志英(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等一批杰出的青年数学家。

目前,武汉大学同时开办了10多个中法联合培养特色班,如中法经济法语双学位班、中法法律法语双学位班、中法七年制医学试验班、中法放射物理硕士班、中法化学本硕连读班等。武汉大学还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伍珀塔尔大学、马尔堡大学等高校合作开设了大地测量、媒体印刷、法学等专业的国际特色班。国际特色班正成为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中国高校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二)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包括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优秀的外籍教师和科学的教学体系,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改进、创新学校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国家大力提倡的、促进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

2002年,武汉大学与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也称HOPE基金会)合作创办了“武汉大学HOPE护理学院”。该学院聘请国际知名的美籍护理教育专家、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玛莎·佩翠尼(Marcia Petrini)博士为院长,并对学院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仅仅三年之后,该学院成为中国内地仅有的两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护理学院之一,该学院也成为中国最高水平的护理学院之一。2008年,该学院培养的护理学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居武大第一位。2005年,佩翠尼教

授获湖北省政府颁发的“编钟奖”；2008年，她又获得国家外专局颁发的“友谊奖”。

(三) 推动国际学生交流

国际化的人才首先应该有国际经历，在广泛磨砺的基础上形成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因而学生的跨国流动，即“第二校园”经历的获取，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宝贵途径。许多大学，包括中国高校，都与外国交流伙伴学校之间达成了学生互换协议；不少国家和政府，例如新加坡教育署，设立了支持本国学生出国交流的奖学金；还有一些国际组织还发起了地区性的学生交换项目，例如欧洲联盟发起的“伊拉斯莫计划(Erasmus Program)”。

武汉大学将国际合作与交流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之中，重点在于通过国际交流，努力拓宽培养渠道，尤其是大力推动学生出国交流。2008年，武汉大学执行了70多个学生出国交流项目，选送了400多名本科生赴国外高校学习和交流，其中包括法国巴黎十一大、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名校。同时，为推动双向交流，武汉大学自2006年开始每年举办全英文授课的“珞珈国际夏令营”。

(四) 创立国际科研合作平台

国际科研合作机构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把握国际前沿动态人才的最佳平台。在高水平人才培养方面，武汉大学借助活跃的国际交流，组建国际科研合作机构，着力打造高水平科研人才的培养基地。近年来，武汉大学着力打造了十多个国际科研合作平台。例如，2007年，武汉大学设立了三所国际科研合作机构：武汉大学医学部与法国健康医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合作建立的“中法肝病研究所”；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与美国耶鲁大学免疫学系合作建立的“海外留学人员开放实验室”；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泰国科技部合作建立的“泰国诗琳通公主国际信息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科研平台对于促进武汉大学与世界一流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培养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意义重大。

三、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目前，高校的国际交流，已从最初的相互考察、相互了解的“广交

朋友式”的阶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联合培养人才和合作科研的实质性合作阶段。然而,尽管中国高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等领域已取得了为世人称道的长足进步,深化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却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程。中国高校具有自身的国情和校情,如数目众多、层次不一、水平不齐等,但在国际化人才的联合培养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一) 国际交流的受益面太小

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高校,都对开展国际交流提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规划,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或国际化的人才,似乎已成为中国高校的普遍追求,尤其是“211”或“985”高校,更是制定了建设“国际化”或“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高校国际交流的现状做一个客观的、以数据为基础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目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还只是“美好愿景”。

以本科生的短期出国交流为例,武汉大学目前每年有机会出国交流的本科生人数在400人次左右,相较武大每届近8000人的本科生人数,出国人数的比例勉强达到5%。西欧发达国家高校本科生出国的比例一般为20%到30%。而中国高校要实现本科生出国比例10%的目标,至少还需要5至8年的不懈努力。

具体到国际交流的其他方面,譬如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组织的活动、学生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等方面,机会依然稀少,还是“僧多粥少”的局面。

(二) 学生交换项目难以持续发展

开展学生交换项目应该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直接、有效的方式。正所谓“足行千里路,胜破万卷书”,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对于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思考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至关重要。目前,中国高校都在不遗余力地与国外大学商谈学生交换事宜,也开展了不少学生交换项目。然而,几乎中国的所有高校,包括“985”大学,都面临着如何推动学生交换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例如,武汉大学与亚洲地区大多数一流大学都有学生互换协议,但往往是我方派送出国的学生大大多于接受对方学生人数,派出与境高等教育领域,跨境输入远远大于

跨境输出。中国政府和高校已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积极尝试着改变这一局面。目前,中国高校采取的举措主要是创新留学生培养的模式和提高留学生培养的素质。

武汉大学在人才培养的跨境输出领域有所突破。从2005年开始,武汉大学分别与越南河内外国语大学、韩国淑明女子大学合作开展“2+2”双学位项目。越南、韩国学生在其母校学习两年后,前来武大继续学习两年,可获武汉大学汉语言学士学位和其母校的学士学位。此类项目进展顺利,有望推广到其它专业。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高校都在努力推行自身的国际化办学战略。国际化人才培养,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也引起了中国高校的充分关注和践行。中国高校应当在立足国情和校情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一条适合自身需要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之路。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62卷第6期)

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新趋势

——大学国际联盟的产生及其影响

李岩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国际联盟异军突起,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界引人瞩目的现象。大学国际联盟致力于建立大学间的资源共享和项目合作机制,促进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让学生能够接触更为宽泛的学科和多元文化,如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1996年成立),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1997年成立),21世纪大学联盟(U21,1997年成立),东亚四国校长论坛(BESETOHA,1998年成立),研究型大学国际联盟(IARU,2006年成立)等等。这些大学国际联盟既有全球

性的大学联盟、跨洲际的大学联盟,也有区域性的大学联盟。从联盟组织的成员看,成员学校不仅在国内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居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与传统的校际合作和国内联盟不同,当今大学国际联盟打破了国家和区域的界限,成员学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长,大学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呈现出多元机制。在合作方式上,突破“一对一”的双边合作模式,采取多边并存的网状组织模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大学联盟有效地促进各大学之间的科教合作与交流,极大地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程度,其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一、全球化与国际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国际化并非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在古希腊就曾盛行“游教”和“游学”之风,这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萌芽。尽管“游学”或“游教”所发生的范围很小,但从某种程度上已显示出高等教育的世界性特征。到了中世纪,西方的大学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规模和范围,采取无国籍限制的招生方式,招收来自不同地区、民族的学者和学生。高等教育经过漫长的摸索和发展,至二战前,出现了专门的机构组织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如1919年在美国成立的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和1934年英国议会设立的国际教育研究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这表现在:一方面,大多数国家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其高等学校就必须参与全球性的人才市场和智力资本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对高等教育的要求突破了国家疆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相信,具备国际化的知识技能和海外学习经验,将为就业增加不少筹码。单凭保持大学传统的内部资源优势(如对国家人才培养的垄断)已很难发挥大学竞争的优势。如何以新的观念和姿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成了各国高等教育实现国际参与的契机和难题。如同前加州总校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1980年出版的《扩展高等教育的国际维度》一书中所呼吁的: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赠地学院”观念的新的高等教育观念,即高等教育要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等于高等教育全球化。全球化强调的是基于互

联网的、标准化、市场化、同一化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一种超越国家、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约束的、消除各种文化差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模式。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高等教育是作为自由贸易的产物而存在的。而国际化强调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世界范围统一的模式或单极的世界,而是尊重国家的边界,尊重文化的差异,讲求质量的塑造,结构的互补,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语境中是作为公共产品而存在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在欧美被广泛使用,而高等教育全球化概念的广泛使用则始于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这两个词汇在使用的意旨上既相区别,又有重叠。“全球化”概念的引入使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施方式和国际化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化的范围已超越国家与国家的框架,逐渐发展为区域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进而超越区域性合作而趋向全球范围的合作。尤其是伴随着主权国家地位的模糊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影响范围和规模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几乎达到全球化的程度。高等学校的国际间人员交流更加频繁,规模日益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也日趋丰富和多样化,从以往单纯、外在的人员交流,扩大到课程的国际化和跨国教育等方面。不仅发达国家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更是将课程国际化作为实现整个高等教育国际化、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和培养国际型人才的主要途径。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向全球化的转向,预示着高校或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可持续的跨国、跨文化维度的整合过程的出现。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大学之间建立联盟的理念被普遍接受。大学需要更多地关注外部世界,展开多国合作与交流,而不是闭门造车。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国内大学联盟只立足于国家内部,难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创新要求。尽管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传统高等教育知识体系仍在延续,却不得不吐故纳新,以适应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全球合作的趋势。

二、当代大学国际联盟的特征及优势

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正日益减少对本国环境的依赖,不再局限于

在本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寻求自身定位,而是力图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重新获得定位,力图能够在国际高校之林中有所作为。近二十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向“院校主导型”转变。大学国际联盟的诞生,可谓是“院校主导型”国际化的具体行动。大学国际联盟是指由一所或几所大学共同发起,以增进合作、促进交流为宗旨,以服务联盟成员、服务地区或全球为使命、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地区或全球范围的重大课题而进行合作的大学联合体。大学国际联盟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大学国际联盟具有正式的组织性特征,其管理主体通常是成员学校校长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负责大学国际联盟的正常运作,定期召开例会,确立联盟的指导方针和活动程序,讨论提交的方案,评估正在执行的项目,并解决大学共同关心的问题及其他重大政策的相关事宜。大学国际联盟对成员校有严格的入会条件,一方面通过组织教学交流、学术评价等活动,帮助其会员大学成长;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监督成员大学的办学质量和办学行为。

第二,大学国际联盟具有民间性的特征,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不需要对政府负责。民间性的特征使其区别于政府体制内的组织,也区别于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更有利于学术的自由交流与合作。

第三,大学联盟具有非营利性特征。尽管也有一些跨国教育团体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但大多数大学国际联盟具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特征。大学国际联盟所筹得的资金不能分配给所有者、管理者及志愿参与的一般人员,这使得大学国际联盟组织区别于私营企业,也使其在组织性质与功能上区别于传统的企业组织和公共行政机构。如果将大学国际联盟组织简单地视作一个经济部门,无疑会“严重忽视了它的社会道德意义,制度变革意义及其与经济产业部门之间的本质区别”。

大学国际联盟组织由于自身的特征,而与单一的跨国大学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首先,在联盟组织中,每个成员学校在其本国范围内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和健全的机构,这有助于成员学校保持在当地已获得的知名度,并将已取得的传统教育成果资本化,进而通过已建立的伙

伴学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运作。一般而言,各成员学校的伙伴学校基本上是同类别的学校,具有同等强大的实力和声望。这种强强联合的方式比通过各自的分支机构运作更有优势。大学国际联盟也比其他任何单一机构的运作更为有力,这是因为一方面单个学校除进行国际化运作和竞争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国际化运作是一个庞大和复杂的体系,任何单个的学校都缺乏应对由于国际化运作而产生的一切复杂问题的能力。其次,在大学国际联盟系统化的国际合作框架中,大学国际联盟有效的质量保证,将使联盟中的各个成员学校的高等教育证书获得全球认可成为可能,在一国得到认可的高等教育证书可以由此而向全世界推广。大学国际联盟中的伙伴学校通过各种层面的交流,集思广益,改善共同面临的学术处境,并在某些特色领域建立稳固而长期的国际合作;互通有无,塑造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人员;共享最新科教成果,在有限授权的基础上分享课程,促进学生在国际间的流动。

在大学国际联盟的体系中,每所大学的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相对于其他大学来说,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异质性资源,这些异质性资源会给大学带来与其他大学难以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而造成这种核心竞争力的资源可能是其他大学的战略缺口。任何一所大学,不管其学科门类有多么齐全,是不可能每个学科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缔结战略性国际联盟显然有助于创造一个便于知识分享和交流的环境,通过人员交流、技术分享、联合科研等方式增强各联盟成员之间交流与合作,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这些因素促使高校必须面向世界,探求新的发展战略,寻求合作伙伴。

三、大学国际联盟对中国高校国际化的启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世界著名高校参与大学国际联盟,以及大学国际联盟在目标上的多样化和组织上的规范化,大学国际联盟日益成为各个大学之间加强交流、互相借鉴、增进合作的新平台,这极大突破了高校传统意义上以双边交流为主的形式而转向多边交流与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席卷各大高校,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向跨国家、跨机构的全球性合作而努力。大学需要相互联结,以吸引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人才形成智囊团,进而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

面积极开展跨国院校合作。建立全球高校联盟成为高等教育追求教育和科技卓越的重要战略。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联合体的新形式,中国高校可以从大学国际联盟获得诸多启示:

启示之一:中国高校应与时俱进地把握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把握国际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建立在自发基础上的松散国际组织,大学国际联盟能够最迅速和有效地实现跨国、跨文化交流。本土文化参与的全球化并不是世界文化来包围我们,而是本土文化要走向世界。高等学校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民族的诸多传统,负载着特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对高等学校“本土化”使命的强调,不能同国际化割裂开来。在一体与多元并存的全球化时代,本土化是国际化的内在要求。对中国高校而言,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至关重要。大学国际联盟的成员学校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度,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教育体制和大学文化。大学国际联盟中的成员学校之间的交流是建立在教育的优势和特色互补的基础之上,对各个大学差异的认可与包容是大学国际联盟存在的前提。大学国际联盟的存在,是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展开的表现,但并不等同于高等教育的同一化。任何高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都不能放弃或弱化自己在本国发展中所承担的政治和文化职能,而是应以各自文化特性作为与其他国家民族进行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提,始终保持“本土”特性。

启示之二:中国高校应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增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紧迫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高校应该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面向全球发展的战略规划,未雨绸缪。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必然导致政府和其他主要利益群体重新审视大学的职能,大学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各国政府大多认同大学的主要功能是帮助驱动和支撑全球化中的国家竞争力。人们认为高等教育在提供新知识以保护或增进全球性经济中的国家地位,以及把社会中广泛人群的技能提高到一个较高水平方面至关重要。美国早就意识到这一点。1983年

4月,美国高质量教育发展委员会发表一份名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指出美国教育严重不适应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时代的要求,教育改革的滞后,已经使美国处于危机之中。美国是世界经济强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流大学,科技实力居全球首位,但却称“国家处于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不是来自政治,不是来自军事,也不是来自经济,而是来自教育。”美国对教育的危机感值得中国高等教育界深思。中国致力于现代化的建设,关键在于培养优良充足的人才,形成雄厚的人力资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几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公立的,它们代表的是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高等教育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专注于科研、以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领袖人才的研究型大学担负着最为重要的使命。世界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几乎毫无例外地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如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曾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出不少的国家领导者和企业家。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大多数政府力使大学的办学目标与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相一致,在科技研发上采取了绩效经费投入和竞争投入的模式,保证一部分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始终能专注于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为提高国家的建设能力而努力,而不是一味的以赢利为目的。为此在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的国际竞争中,政府的角色和针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政府从研发经费的投入者转变为大学国际竞争的协助者,并用相关政策法规协助大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由于我国的一流大学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是有效的,因此对于国内高校来说,应该采取“合作”优先于“竞争”的发展策略。优秀的大学国际联盟往往集中了雄踞世界高等教育顶端的一流名校,它们通过成立联盟的方式实现强强合作,分享彼此的优势资源。加入大学国际联盟有助于实现我国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当然,政府也应在增进大学参与国际合作上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

启示之三:大学要不断地提高科研水平和国际声誉,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不断地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在经济全球化时

代,教育的理念和模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大学间的合作和交流日益频仍,竞争日益激烈。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入世界教育,已是大势所趋。大学国际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高校从区域局限走向广域开放,从低水平提升到高水准的全过程。在当前的发展条件下大力倡导大学国际化,就是要把握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其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学术水准和管理水准的国际化。大学国际化就是要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置于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在广泛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经验和科技文化成果的同时,注重对外输出本国的教育和文化,培养能够在国际交流和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高端人才。

启示之四:平衡长远发展与短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完善大学国际合作机制,推动大学国际联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学国际联盟的产生既是大学谋求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路径的内在要求,从更深层次说,也是建构新型世界秩序的需求。如果说前者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话,那么后者则以鲜明的民间性特征,履行着全球治理和发展的重要职能。以大学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球化时代各国追求自身价值的长远动力。大学国际联盟正参与到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正通过规范的力量和相应的制度建设,塑造非国家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大学国际联盟通过举办各种论坛,展开针对世界性问题的联合科研等多种途径,通过组织之间的网络联系,促使大学在本国政治中充分发挥知识生产先锋的作用;在全球性公共问题上积极发言,帮助建构普世价值;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国际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意见。

启示之五:以务实的态度从事重大应用型理论问题的研究。全球化时代,安全、环境、人权、可持续发展、分配正义、人道正义干预、恐怖主义和妇女权利等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学者考虑的重点。面对这些棘手问题,许多人质疑政府治理机制,而对大学国际联盟寄予厚望。大学国际联盟因其特殊的组织形式和高度的国际参与能力,能充分调动自身科研优势和知识资源,间接或直接参与解决国际公共问题的行动,因而在诸多问题上拥有优先发言权。以务实的态度在影响世界社会经济变化的前沿领域和实际问题中寻找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口,既是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也是极大提升大学国际联盟和参与国际公共问题,促进向科研社会转化的关键。

尽管对于中国是否应该融入全球化,在理论上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在现实中,中国却坚定地选择了融入世界。尽管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其负效应的一面,但合理性与进步性是更为本质的东西,融入全球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有效维护并增加国家利益,提高竞争力,加快发展步伐。大学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智力的关键载体,是一国知识、文化保存延续的命脉之所在,也是技术创新、思维变革的源泉所在。纵观国际一流大学,无不把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推动学校发展的战略选择。全球化要求高等教育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加强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利用全球的资源促进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用人才,以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掌握制高点。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动态

浙工大成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高性能太阳能电池动力汽车、纳米剪刀,这些饱含技术含量的高科技产品,或许不久后就能面市。近日,浙江工业大学“能源材料及应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成立,它的职能,除了在科技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外,还将研发高新技术产品,让它们尽快进入普通家庭。在成立之初,这个机构就先后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乌克兰国立科

技大学等多所国外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并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聘请多位能源材料领域的著名专家作为基地的客座教授。

有了这些顶尖专家的加盟，与能源相关的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问题将被一一攻克。目前，基地已经着手研发太阳能电池动力汽车、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纳米剪刀等一系列环保节能高效新产品。令人欣慰的是，一部分合作成果已经完成产业化。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是科技部下设的国家级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于 2007 年开始设立，能有效地整合国际间的资源，实现国际科技合作。

（摘自：每日商报，2009-12-25）

中科院创新国际科技合作模式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 10 月 30 日电（记者胡浩、顾瑞珍）记者日前在走访中国科学院时获悉，建院 60 年来，特别是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中科院加强国际合作战略布局，创新合作模式，国际合作得到迅速发展。

自 1998 年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中科院对外交流规模持续扩大，合作形式不断创新，国际合作从一般的人员交流发展到双方共同酝酿合作项目；从项目合作进而实行共建联合研究机构；从单方受益逐渐过渡到合作方双赢或共赢的局面。

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中科院梳理了国际合作思路，明确了国际合作政策及重点科技领域，坚持以发展与国际一流研究机构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促进与国外重要国立科研机构、著名大学和跨国企业的多种形式的合作，努力引入新的科学思想和先进管理理念，凝聚和培养创新人才，紧密结合重大科研项目和重要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提高中科院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合作能力。

按照从“人员交流、项目合作”，到“所级合作、共建中外联合研究机构、合作研究基地与创新团队”的新合作模式，中科院与德国

马普学会合作建立了青年科学家小组和伙伴小组，采取国际化的管理和评估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公开择优聘用优秀青年科学家担任组长，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学术带头人。1997年，中科院与法国合作，成立我国与法国合作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层面上的基础研究联合实验室“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

(摘自:新华网 2009-10-30)

高校国际交往的典范

——记中国农业大学与德国霍恩海姆大学合作交流 30 年

宋晓梦

改革开放以后，开展国际交流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像中国农业大学与德国霍恩海姆大学那样，以两校的国际合作，带动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并推动了整个国家农业科技领域进步的历程，却堪称高校国际交往的典范——这是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农业大学与德国霍恩海姆大学交流合作 30 周年纪念活动中，与会代表对两校这段交往史的一致评价。

虚心学习，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1979年9月，经国家农业部、外交部、教育部批准，中国农业大学与在欧洲农业学科实力雄厚的霍恩海姆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农业，两校合作初期，德国学者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先后在农业大学举办了生产经济学、植物营养学、农业工程学、植保喷雾机械等讲习班。全国50多个高等农业院校前来听课，形成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院校教师专业学习的第一个热潮。接着，德国学者又帮助中国农大开展了施肥与产量、植物营养、玉米免耕种植等三个项目的研究，农大学者从中学习了农业科学的研究方法、数据测试分析、研究报告的写作等等，从此他们的研究提升到了国际双边研究的水平。

1983年，中德“综合农业发展”项目(CIAD)的启动，标志着两校的合作上升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农业合作。10年中该项目在土壤、

作物遗传、畜牧工程、食品科学等十几个领域先后引进了 25 项先进农业技术，经过农大和霍恩海姆两校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消化吸收，在黄淮海平原地区推广，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德方教授先后来华培训了 5000 多人次，德国霍恩海姆大学为中国农业教育科研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今天的农大校长柯炳生教授和农业部牛盾副部长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德国政府对中国农业的这一援助性项目，大大改善了中国农大的科研条件，提升了中国农大的科研实力。项目实施过程中，农大学者获得国家级奖 3 项，省部级奖 20 项。在较短的时间里成为全国农业院校的领头羊。德国前总理柯尔在总结中德合作经验时表示：CIAD 项目，是中德合作的典范。

互利互补，同为世界农业作贡献

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和科研设施水平的提高，两校的交往逐步从中方单纯受援，发展为在学术领域的平等交流。柯炳生等一批中国学者，从跟着德国导师做课题，到与德国学者共同成为项目负责人；从以往的单方面培养中国研究生，转变为双方共同培养中德研究生；研究的重点也转向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

中德“华北平原环境可承受的持续农业研究”（BMBF）项目，通过对环境影响因素的系统监测，为我国政府的农业宏观决策和农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德“华北平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IRTG）项目，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资源与环境研究仪器、研究方法和相关的评价模型，揭示了中国高产、高效农业的理论核心，并正逐步将基础研究的成果推广到整个区域的农业生产；德国学者也从研究中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数据。

两国科学家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体系中做出的这些国际前沿的研究工作，引起世界同行的重视：中国农大学者的研究成果陆续见诸国际期刊、国际会议论文集。在中德 BMBF 项目中，他们共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 I 论文 30 余篇；在 IR TG 项目中，目前已发表论文 33 篇，其中 SC I/EI 论文 19 篇。

在这些项目中，中国政府先后授予 3 位贡献突出的德国科学家“国家友谊”奖。

在项目中成长的数百位中国农业大学和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每年都要到对方国家学习和调研，已毕业的中国博士生成为一代年轻的学科骨干；霍恩海姆大学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则在国际会议上获奖。他们的交往，既为中德农业的未来储备了高层人才，也将续写两国人民的友谊。

对高校国际合作的几点启示

针对我国高校国际交流中，一些学校存在的蜻蜓点水，泛泛往来，效率不高等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和霍恩海姆大学卓有成效的 30 年合作历程，给我国高校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哪些启示？这是纪念活动中专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他们认为：首先，找到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稳定而长期的研究方向，是使研究深入、持久发展从而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其次，一系列符合两国发展需要同时又是人类发展急需解决的项目，是使研究能够取得来自两国政府、欧盟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研究经费方面大力支持的前提。第三，研究人员的代代相传，密切往来，从而增进了解，增进友谊是合作研究的接力棒和润滑剂。

（摘自：光明日报 2009-5-24）

发送范围：校领导

主编：丁三青 副主编：李爱彬 责编：祁慧勇 本期编辑：杜卉卉

助理编辑：宋晓猛 电话：0516—83590385 E-mail: fzghc@cumt.edu.cn
